

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出版

吴秀华◎著

汤显祖《邯郸梦记》校注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陽显祖《邯鄲夢記》校注

吳秀華◎著



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出版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显祖《邯郸梦记》校注/(明)汤显祖著;吴秀华校注. —石家庄:
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4.11

ISBN 7-5434-5740-7

I. 汤… II. ①汤…②吴… III. 邯郸梦记-注释 IV. I23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153 号

书 名 汤显祖《邯郸梦记》校注

责任编辑 孟保青 杨 刚

装帧设计 谷云燕

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,050061

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(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201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625

字 数 317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34-5740-7/I·920

定 价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徐春芳 陈志伟

前 言

《邯郸梦记》（又称《邯郸记》《邯郸梦》）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之一，这部作品写于汤显祖的晚年^[1]，因而沉淀了汤显祖对家庭、官场、人生的根本性认识。它不仅是中国戏剧史上集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哲理性于一体的代表性作品，也是我们观察明代士大夫阶层心灵变化轨迹的一个重要媒介。正因如此，《邯郸梦记》在明代文学史、戏剧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。

《邯郸梦记》本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^[2]，故事叙一名叫吕翁者，在邯郸道一小店中遇一少年卢生，二人接席言笑，殊畅久之，少年自顾衣装敝褻，感叹生世不谐而困如是。吕翁请教其何为适之，少年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，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方为适意。恰少年思寐，吕翁从囊中取一瓷枕送之，并说枕此当令子荣适如意。果然，卢生梦见自己来到一处豪宅，娶清河崔氏为妻。崔氏美而家产丰，卢生由是得以衣裘食精。明年，崔氏送其金钱，令往京城应试，取为进士，授官校书郎，后为监察御史、起居舍人掌制诰。再出为陕州知州，开河八十里，因功升任汴州、岭南道采访使，入为京兆尹。时吐番内犯，瓜州节度使王君奭被杀，卢生临危受命，出为

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大破戎虏，斩首七千级，开边九百里。归朝，升至御史大夫兼吏部尚书，一时间权倾朝野，大为宰相所忌，以飞语贬为端州刺史，三年后方还朝。不久，卢生再度被诬，以交结边将罪而下狱，后死罪获免，出为驩牧。数年后，帝知其冤，复官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所生五子分别被授职，所结姻亲皆天下名门望族。卢生至此再度殊渥，他出入中外，回翔台阁达三十余年，崇盛赫奕，一时无比。卢生拥有良田甲第，佳人名马，寿至八十，安然而逝。醒来后，卢生见吕翁在旁，黄粱饭尚未熟，由此醒悟人生如梦，随吕翁游仙而去。

汤显祖的《邯郸梦记》将吕翁作吕洞宾，增加了先度何仙姑在山门扫花，因其证入仙班，山门缺少扫花之人，必至人间再觅扫花者这一情节，使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变的更为合理清晰。无论是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，还是汤显祖的传奇戏剧《邯郸梦记》，它们都是在一定史实基础上加工完成的。作品中提到的萧嵩、裴光庭、宇文融、王君奭等人，都是唐代政府中的高官。作品涉及到的许多事，也非子虚乌有。如崔氏织锦回文诗一事，是借用唐代会昌年间边将张揆之妻侯氏之事附会而成。张揆戍边十年未归，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进献圣上，得到皇帝的赞赏，“敕赐绢三百匹，以彰才美。”^[3]剧中的卢生开河二百八十里（《枕中记》中作八十里），凿潭通槽，皇帝东巡，歌女迎驾，牙盘献食等事，乃玄宗时陕州太守韦坚之事^[4]。其他如吐蕃将领悉那逻、热龙莽，也实有其人，只是在《唐书》中作悉诺罗恭禄、烛龙莽布支，名字略有改窜。而设反间计破虏者，则为唐代被封宋国公的萧瑀。显然，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最初创作时，当与唐代的官场现实有关。后元人马致远等又以此题材撰《黄粱梦》杂剧，流露了在蒙元贵族统治下，浮生如梦的出世思想。汤显祖作为一个一

度热衷于政治，却最终以心灰意冷结束官场生涯者，将此故事演为传奇，当融入了他的人生感怀，特别是增强了对明代官场权臣当道现象的讽刺与批判。基于此，《邯郸梦记》当是一部暴露政治黑暗，探索人生之路的剧作。

前人在论及汤显祖戏剧时，大多标举其《牡丹亭》。汤显祖本人也曾说过：“一生‘四梦’，得意处惟在《牡丹》。”^[5]从汤显祖的话中，人们大多得出了在“临川四梦”中，惟有《牡丹亭》是最好的结论。然而这样的结论是片面的。王思任在引述汤显祖的话时，是着眼于曲词的优美和意境的神妙^[6]而言的。明代中后期，词曲格律问题一直是剧作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，词曲优美与否，格律是否合乎规范，是时人评定一部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。在这样的剧坛氛围中，汤显祖得意于这部不太讲究格律，而重视“意趣神色”的《牡丹亭》，是带有挑战剧坛风尚的意味的。再者，爱情剧作为明代剧坛的主流戏种，此时已被表现的有些俗烂，人们讲究的已不再是情之有无，而是故事情节上的花样翻新。《牡丹亭》在情节上的独特之处是他的“还魂”设计，虽然元代郑光祖的《倩女离魂》已有此类设计，但二者在还魂方式上是不同的：一个是离魂，一个是死而复生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还魂。《牡丹亭》在情节上的创新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，其影响我们可从吴炳、孟称舜等众多效法者身上看到。显然，《牡丹亭》受到热烈的推崇，除了它本身词曲确实优美，情节富有创意外，更有汤显祖的叛逆精神和时代好尚心理在起作用。但这并不等于

说其他剧作在曲词、意境等方面便不值得称道。事实上，若就作品所表现的话题而言，《邯郸梦记》显示出了远较《牡丹亭》更耐人咀嚼和思索的厚重性。

《牡丹亭》所涉及的，主要是女性的生存环境和情爱自由问题。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女性群体和整个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，但女性作为男权社会中的配角，一个亚群体，由她身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，相对于男权社会主流意识而言，却是次要的。而《邯郸梦记》却恰恰反映的是男性主流意识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一个问题：男性的人生目的和存在状态问题。中国的儒家文化中，为男性树立的人生目标是：建功立业、致身通显、留名千古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投入到社会政治、经济生活中。在这一主流思想支配下，许多男性实现了他们的人生夙愿，过上了钟鸣鼎食、驷马轩车式的高贵生活。然而，他们并不幸福，也没有就此完全满足。这种不幸福感，除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帝王性情的摇摆不定，时时会令他们“汗不敢出”外，更有情场上的失意落魄，子孙童仆的为非作歹，戚里友朋的攀援沾溉等，也时刻令他们的内心不能得到应有的安宁。生命的疲累、奋斗的艰辛，十年，甚至数十年寒窗苦读的结果，走的其实是一条低眉俯首、仰人鼻息、谨小慎微，或者埋首案牍、争诉群僚、奔趋势门的人生道路，这不能不使汤显祖这类讲究人格操守的士大夫，去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的问题，去寻找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生存方式。

和《牡丹亭》一样，《邯郸梦记》所表现的也是生命存在的本质问题，即生命存在的自由性、自在性问题。但对这两个问题的反思与表现，其话题本身的分量和价值，《邯郸梦记》所揭示的，远较《牡丹亭》具有永恒性。因为后者已经通过婚姻制度的

变化，女性个性解放意识的增强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而前者直至现代社会，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况且，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金钱物欲的加速膨胀，人的异化现象更加明显。可以说，人的自由性、自在性问题，已经从往日的仕宦阶层，转移到了更广大的人群身上。许多人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：是追求功名和金钱，还是过一种虽简朴但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毕竟，追求功名和金钱是世俗社会里人的价值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，我们难以想像，如果整个社会都视功名和金钱如草芥，那这个社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。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是老庄学说肯定的生活方式，这种生活方式虽宁静、安详，但它的自闭性、排外性，决定了它根本不适应主流世界的发展方向。但是，当人们将功名和金钱视为人生目标时，一旦撒手人寰，又能带走什么？是否就此满足？我们看到，当卢生被宇文融陷害，来到云阳市即将明正典刑时，他怀念自己衣短裘，乘青驹，慢步邯郸道上，那种虽寂寞平淡，但却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而当卢生官复原职，再操权柄，与皇帝赠送的二十四部女乐极尽欢愉之时，他又完全沉浸到了其中，渴望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。在弥留之际，名位和官爵仍是卢生所最关注的，生命的戛然而止，给他带来的是太多的遗憾。这太多的遗憾，表明卢生虽位极人臣，享尽了人间之乐，但其内心仍是不满足的。

汤显祖对卢生形象的刻画，是对人的可悲性的真实描述，一方面，人的贪欲、功名欲使人感受着生活的诸多馈赠，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；另一方面，贪欲和功名欲又使人每每招灾惹祸，寝食不宁，最终作茧自缚，被贪欲和功名欲所丧送。在明代的大学士中，就有不少人命运悲惨，他们中有的被送上了断头台，有的被削职为民，有的暮年流放边地，有的甚至死后尸棺被掘，家

产被抄，子孙飘零。据《明史》所载，明代崇祯年间，相继有五十位大学士走马灯似地上任，此后便是或被撤职，或被杀头。崇祯执政十七年，几乎一年三次更替大学士，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帝王与臣僚之间，根本没有信任可言。然而，尽管通往权力的路会遇到刀山火海，但许多人仍会像飞蛾扑火一样勇往直前，因为人时常满怀着希望，相信祸福相倚的道理，正如卢生在鬼门关淹淹待毙之时，忽有天使到来，转达丝纶之音，刹那间便由囚徒变成了当朝首相，芸芸众生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命运也有如此戏剧性的转折？看来，要看破世情，达到涅槃的境界并非轻而易举。何况，即使达到了涅槃的境界，又能如何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和生命存在的不可重复性，促使人要为所谓的理想不懈地奋斗，即使头破血流，九死一生，也无怨无悔。由于人的需求毕竟是多样的，功名、金钱之外，人格尊严、生命自由，对一个封建时代的正常男性而言，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，决定了这几方面的实现过程必然充满了艰难曲折。在鱼和熊掌不能到手，甚或不能得兼时，人必将生活于无穷的苦恼之中。这就是《邯郸梦记》向我们揭示出的一个生命存在的现实课题。这一课题，远非《牡丹亭》所能企及。

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，儒释道三者并存，儒代表着人的现实追求，释道则代表着肯定生命本体存在的自然状态。严格说来，二者不能以高低优劣论，但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里，却总是把那些沾染上神仙，宣扬道化的作品归入到消极颓废之列，而把那些“腰下常悬带血刀”追求所谓万户侯的作品，看成是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元代剧作家笔下的神仙道化剧，还是汤显祖笔下的此类情景设计，实质上都代表着作家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重。因为求仙证道，象征着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

义的另类式探索，表明作家要寻找一条不同于功名利禄的新的人生之路。至于这种新的人生之路是否值得肯定，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，至少它说明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批判与失望心态。《邯郸梦记》作为汤显祖晚年深思熟虑式的作品，在一定程度上洞彻了世俗生活中的许多方面，体现了多方面的思想价值。

二

《邯郸梦记》首先从人生道路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给予了形象化的透视。剧中的卢生是明代现实生活中读书人的缩影，他深受儒家传统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影响，盼望有朝一日平步青云，过上富贵至极的生活。比较幸运的是，卢生作为一个乡村儒生，虽然身上的裘衣有些破旧，胯下的坐骑有些瘦弱，但他家有田庄，这使他能够过上肌肤极腴，体胖无恙的生活。然而卢生并不满足于此，在他看来，这样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。为此，他感叹自己的孤穷。卢生的感叹并非故作姿态，而是从心底里不满于自己的生存状态。卢生所认可的人生价值观，与封建正史中所标榜的所谓大丈夫的人生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。秦末陈涉佣耕垄上时，辍耕言道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^[7]；汉代班超埋头牖下时曾言：“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砚间乎？”^[8]这种所谓的丈夫之志，一直为封建正史所推崇，它成了封建时代的男性生活于世间的惟一值得付诸毕生精力的事业。这就难怪身处三家村小店中的卢生，也满身心散发出此类丈夫之志了。然而，作为一个普通儒生，要建功立业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纵观历史上那些建立了

所谓功业的人，他们的功业，除了个人的努力外，更有历史的机遇在其中。在战争年代，有志之士固然可以通过在边庭上一刀一枪的搏杀，博得封妻荫子，青史留名的“伟业”，和平年代又当如何建功立业呢？换句话说，通往权力的路又何从寻觅？一个重要途径便是科举。卢生正是通过科举的途径，走近了权力。

卢生一旦握有权力后，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偷写下夫人诰命，混在众人诰命内，朦胧进呈，侥幸为夫人弄到了一通五花官诰。待东窗事发，不得不前往陕州开河时，他想到的并不是造福万民的事业，而是通过政治作秀，捞取进身的资本。新河刚刚开凿成功，卢生便急忙上书皇帝，邀其御驾东巡，向其展览开河成果。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，他招集四方商贾奇货集于陕州，造作成一片太平繁荣的景象，“各路珍奇，逐队焚香，奏他本土之乐”，“有那番船上回回跳，江汉来朝，都到这河宗献宝”，他又令人沿河插柳，以添胜景，并亲选了九百九十八名殿脚女唱着棹歌欢迎皇帝的到来。你看，“几千艘排列的无喧闹，一队队军民齐跪着，顶香炉咭着细乐。各路的货郎儿，分旗号”^[9]，如此刻意安排下的太平景象，果然博得了龙心大悦。开元皇帝不仅亲自为新河命名，还令中书少监裴光庭作《铁牛颂》，将之刻于碑铭，以彰卢生之功，皇帝还认为卢生功劳之大，可与周召公相提并论。接下来该是论功行赏了，不巧，边疆发生了战事，并不懂兵法战策的卢生奉命挂印征西大将军，依靠实施反间计，他侥幸反败为胜，开边九百里。如此功业，卢生当然要大大地渲染一番，他命人勒石天山以纪其功，“一字字雁行排天际遥”，又担心莓苔风雨，石裂山崩，致使后人不知其功劳，后又自慰道：“也未必早晚间山移石爆。”^[10]此时，卢生心中何曾有国家的概念，更何谈百姓的位置？

开河和开边两大功劳，使卢生骤然间成为皇帝眼中的红人，他被封定西侯，食邑三千户，掌管着天下兵马大权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卢生之妻崔氏被封一品夫人，儿子们“但是长的都与了恩荫”，卢家朱门画戟，紫阁雕檐，文武百官，皆出其门。至此，卢生所谓的功业已经大功告成，如若不是宇文融从中作祟，卢生将一生顺利地安享即得的利益。我们看到，卢生所谓的功业，完全变成了他获取政治利益的资本，而所谓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为官之道，也早已变作了追求实实在在的个人享乐。就在卢生与其妻崔氏“小槽酒滴珍珠红”时，他不会想到陕州那两位曾被驿丞选为押殿脚的囚妇的命运，她们二人的丈夫一个干着剪辒的营生，一个干着吊鸡的营生，在皇帝巡河即将到来时，被驿丞在驿站中偶然遇到，因其有些姿色，便如获至宝一般，不但令其担任押殿脚的头稍，还教其演练引逗皇帝兴味的《采菱》歌。“山磊磊，石崖崖，锹锄流汗血，工食费民财”^[11]，民脂民汗换来了卢生的荣耀，但卢生荣耀之后，是否想到了百姓？卢生在鬼门关三年，亲身体会到当地百姓生活的艰难，他们吃的是青橄榄，住的是狗排栏，飓风起时如置身于万顷波涛之中，但这一段艰难时日，也仅成了卢生“画屏风边际览”的往事回忆，那些前来送行的黑鬼们何曾沾上卢老爷的半滴恩泽，又何曾想到回京后的卢生竟与皇帝赠送的二十四名女乐行采战之术？对这二十四名女乐，他先是引经据典，道貌岸然地说“不可近她”，待崔氏要将之退还给朝廷时，又立刻说道：“不可虚君之赐。所谓却之不恭，受之惶愧了。”^[12]这一却一受，卢生之虚伪和腆颜毕现。汤显祖通过卢生形象告诉人们：封建文化中所标榜的功业，其实只不过是为人捞取利益的幌子而已，而建功立业者，又只是皇帝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。汤显祖用形象诠释了封建

正统文化中某些慷慨的言词，剥下了他们虚伪的外衣，对儒家倡导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在明代的扭曲变态给予了讽刺，提出了质疑。

三

在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中，有一层关系是君臣关系。二程言：“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乎天地之间”^{〔13〕}。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一样，是一种绝对的统属关系，但与父子之间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关系不同，君臣之间完全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，这决定了二者间的冷漠性、若即若离性、忽冷忽热性。在卢生和开元皇帝之间，正体现的是这种性质。历史上的开元皇帝创造了开元盛世，曾被人们誉为明君，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明君，在汤显祖笔下，也是那么俗气十足，贤愚不分，秉性乖张。他的俗气首先从他的爱财中体现出来。科举是封建时代的大典，不仅担负着为国家选才的重任，而且关乎士风民风，就是这样的大典，在朝廷那里也几乎成了儿戏。卢生作为乡间的普通儒生，书史虽然得读，但才学毕竟不及名门望族之后的萧、裴二人，因而他的试卷被主考官宇文融斫落是在情理之中的。然而世事难料，宇文融作为权臣，虽然有呼风唤雨的能量，但他的能量在卢生强大的金钱攻势下被一笔抹掉，卢生“将金货广交朝贵，竦动了君王，在落卷中翻出做个第一。”^{〔14〕}作为一国之君，皇帝并非不知道科场舞弊问题，但他却对卢生贿赂满朝勋贵的行为听之任之，原因就在于皇帝也爱财。开元皇帝的爱财，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明代万历皇帝对民间的征索行为。为了聚敛

钱财，万历帝曾派出矿监、税监，四处采金搜宝，致使民怨沸腾。而明代官员的考核升调，金钱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。贿赂公行，有钱就有官的事实，使汤显祖笔下的开元皇帝，决非是作者的无心塑造，而是有意为之。

开元皇帝的俗气还表现在他喜欢奉承，讲究排场上。他驾临陕州，场面极其壮观，“瞳瞳谷暗千旗出，汹汹山鸣万乘来。”^[15]卢生投其所好，迎驾工作极尽铺张热闹之能事。“打排公馆似仙家，昼夜瞻迎鸾驾”^[16]，且看卢生所做的准备：一是安排住处。有先年造下的绣岭宫，三宫六院，现成齐备，扈从文武，俱有公馆。二是钱粮开销。调拨东京七十四州县津分帖济。三是仪仗队所需之物。要曲柄红罗伞一把，从绣岭宫鸾驾库中借出。四是安排宴席。绕龙盘尽插花，牙盘献上膳千品。五是管待皇帝身边的太监。因担心太监从中刁难，预先给高力士送礼，令其约束手下。六是安排好欢迎的队伍。训练了一千名殿脚采女，唱棹歌以悦圣心。七是招集四方商贾以添太平繁荣景象，营造治绩。具体做法是：分付各路粮货船千百余艘，着以五方旗色，编齐纲运。逐队写着某路白粮，某州奇货，每船上焚香，奏其本地之乐。八是造下大龙舟一只。以便皇帝乘舟游幸，观览胜景。九是沿河植柳，增加自然美感，营造湖光山色。十是写下欢迎词，准备膝行而进临天表。十一是出境三百里迎接鸾驾，以示对圣驾的尊崇。卢生的接待工作热烈而隆重，所费心思和气力决不亚于凿开顽石，引来水源。果然，开元皇帝对身边的臣子们称赞卢生道：“新河站偏他妆的恁好。”

如果说喜欢奉承，讲究排场，是皇帝们的通病的话，那么，面对外敌入侵，草率决定挂印的主帅，便是个别皇帝的性之所至了。当吐蕃内犯的消息传来，君臣震动，皇帝明明知道“酸溜溜

的文官班里”，没有人读过兵书战策，但他仍然听从宇文融的话，派卢生挂印西征。尽管卢生表示“兵凶战危，臣不敢任”，但皇帝却一意孤行，这与其说是对卢生的赏识重用，不如说是将卢生推到了生死的边缘。皇帝对臣子生命的蔑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不能说开元皇帝有意要害卢生，但其对待臣下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卢生御敌有功，被加官晋爵，但宇文融几句陷害卢生的谗言，便将皇帝头脑中刚刚装进去的卢生的功劳全部抹去，刹那间卢生由功臣变成了即将明正典刑的罪臣，身份变化如此之快，只能说明臣子的生命在皇帝的眼中如同玩偶草芥一般。在常人看来，皇帝至少应将卢生召来问一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何况民间官吏审案，还讲究个三推六问，人证、物证呢。对待一个凯旋归来的功臣，怎能如此轻率？卢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阶下囚，还痴想着泣奏当今鸾驾，无奈朝门已闭，正殿已闭，他连一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，臣子之心何其寒也。卢生在鬼门关一呆就是三年，如若不是西番侍子来朝，向皇帝说明卢生之功，卢生之冤恐怕将冤沉海底。而这就是封建时代真实的仕途现状。

卢生从鬼门关赦回，取为当朝首相后，皇帝为了弥补卢生之失，给予了他过分的待遇：盖造功臣甲第和牌坊，敕建各式阁、楼、堂、台、湖山、海子，共二十八所，又赐予夜白飞黄、金谷名园、土地山林（二十一所）、二十四名女乐。后又将卢生封赵国公，食邑五千户，官加上柱国太师，卢生之子也各被授予官职。不能否认，此时皇帝对待卢生的态度仍然是非理智的，体现出臣下荣辱一切皆出于我的极权心态。皇帝对卢生的封赠，也是在为其他臣子树立一个榜样，以便其他人都能像卢生一样，成为皇帝忠实的奴仆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曾对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做过这样的论述：“后世骄君自恣，不以天下万民为事。其所求乎

草野者，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。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，亦不出夫奔走服役，一时免于寒饿，遂感在上之知遇，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，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。”那么，真正的君臣关系应当如何呢？黄宗羲认为，它应当是：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”；“君臣之名，从天下而有之也，吾无天下之责，则吾在君为路人。出而仕于君也，不以天下为事，则君之仆妾也；以天下为事，则君之师友也。”^[17]“仆妾”，是黄宗羲对封建时代“君为臣纲”观念下君臣关系的概括，而“师友”则是他对先秦时代君臣关系的认定。汤显祖所描写的开元皇帝与卢生之间的关系，正所谓黄宗羲所说的“仆妾”关系。

四

《邯郸梦记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官场，这里既有皇帝颇为看重的勋贵、权臣，也有作为名门之后的同僚、同年；既有中央一级的官吏，也有州县一级的官吏；既有京畿一带的官吏，也有远在天涯海角的官吏，可谓囊括了封建官场的方方面面。近人吴梅评价《邯郸梦记》时说：“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，是明季宦途习气，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。”^[18]汤显祖将权臣宇文融对卢生的打击迫害作为情节演进的关结点，将大大小小的官场贯穿起来，活画出了官场众生相。

首先是宇文融对卢生的发难。宇文融的祖上是后魏政权中的高官，宇文家族的宇文觉篡西魏政权建立北周，共历五帝，享国二十四年。因祖上曾有如此“伟业”，故宇文融相比于其他人总

有一种自豪感、优越感。眼下，他号令着三台，权衡着十宰，又主管着科举之事。对于这样一位权倾一朝的人物，卢生竟然没有登门投靠，又在曲江宴上谈容高傲，说什么自己是天子门生，还自比嫦娥，不用老官媒宇文融替自己说亲。这无疑是对宇文融权势地位的挑战，宇文融岂能善罢干休？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出来，而是老谋深算，等待机会处置卢生。果然，这样的机会到来了，卢生掌制诰，自作聪明地为其妻崔氏写下诰命文书，朦胧进呈，获得批准，以为神鬼不知，未料到背后一双鹰眼时刻盯着他，他前脚到家，后脚便有宫中差官到来，宇文融已奏明圣上，将其贬为陕州知州。按说，宇文融也算出了一口气，但他未料到，卢生在陕州开河反而奏了功，面对卢生有可能再次升官的事实，宇文融借吐蕃犯境一事，将卢生再次推离于朝廷之外。久历战阵的大将王君奭尚且被吐蕃所杀，未读兵书不懂战阵的卢生又将若何？显然，宇文融是让卢生去死，借吐蕃人之手除掉这位不肯屈服于己的人，他玩的是临潼斗宝。国家危难，反而成了宇文融图谋私欲的机会。然而，宇文融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，卢生再次奏功，他的凯旋归来和随后的加官晋爵，使得宇文融更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，只得派心腹之人暗中访缉卢生阴事，了解到卢生曾开拆绑在雁足之上的番将私书，便构陷他通番卖国。皇帝的昏庸使宇文融的构陷得逞，卢生先是被判斩刑，后由于高力士的周旋被流放于岭南鬼门关。卢生家产被抄，妻子没入外织机房，儿子不知下落。宇文融认为，此去鬼门关几千里路，况又是烟瘴地面，卢生此去必死无疑。当了解到卢生并未死于中途时，他给崖州司户传去密旨，令其结果卢生性命，并许愿司户：钦取还朝，不次重用。在宇文融与卢生的矛盾中，卢生并没有从实质上得罪过宇文融，仅仅是因为不肯投靠于他，便多次设计加害，宇